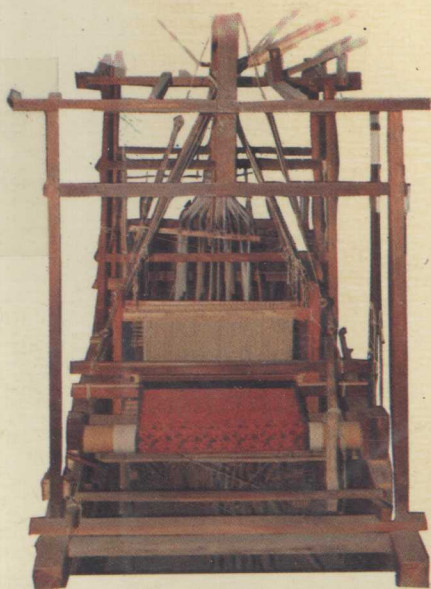


横看成岭侧成峰

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



横看成岭侧成峰
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

茅家琦 万 灵 周忍伟 周洁
林 刚 张守广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长江文明丛书

前 言

一

长期以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内,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过程上。这个重点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两个“过程”并没有涵盖“国情”的全部内容。要了解中国近代的“国情”,还必须研究:从1840年到1949年,这110年中,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究竟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变化的过程怎样?变化的程度如何?从这些变化中可以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这些问题概括到一点,就是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本着这个认识,本书的作者们就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方面——城市近代化的轨迹进行了探索,撰写了这部书稿。

二

这部书稿在内容上,大体想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1840年以前,中国城市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为什么没有能够进入近代?

第二,1840年以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中国城市逐步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发展过程如何?

第三,中国城市近代化和接受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何?中国城市人民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如何?接受西方文化和增强反帝反封建革命力量的关系又如何?

第四,除了西方文化外,影响着中国城市近代化的主要因素还

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何使各个城市的近代化走着不同的道路？

第五，各城市近代化的进程，有快有慢，发展不平衡，其原因何在？

三

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城市近代化的研究，不可能以整个国家为对象。采用区域研究的方法是适宜的。因此，本书稿以长江下游城市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说，就是研究安庆以东，南通、扬州以南，宁波、杭州以北这么一大片地区内的城市。为什么选择这个地区？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达，1840年以后近代化的程度也比较显著。

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传统城市的发展方向也不尽相同。一些城市发展成为工商型城市，一些城市发展成为政治型城市，另一些城市则成为文化旅游型或消费型城市。我们认为，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核心。本着这个认识，我们选择了南通、无锡、常州、芜湖、镇江、宁波等六个城市作了典型分析，提出了六种不同的近代化道路。本书没有重点剖析南京、杭州这样的省会城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这两个城市在近代的发展，而是因为根据我们的初步分析，它们在近代化的过程中，近代工商业发展的典型意义似乎不如上述六个城市来得清晰。

在这个地区内，上海城市的发展占有显著地位，但上海又是一个特殊的城市。上海城市近代化的历程，实际上是外国资本主义把近代文明引向上海租界的历程，因此我们没有把当时的上海作为一个典型进行剖析，只是重点研究了上海对长江下游其他城市近代化的辐射作用。

在研究时间上，本书稿原计划写到1949年，但考虑到1937年以后发生了八年抗日战争，紧接着又是三年解放战争，整个社会发展

出现一个特殊的进程，因此，只研究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

四

本书作者们尽了自己的努力。读者能不能从这部书稿中得到一点有益的启示？见仁，见智？这还得由读者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考虑。

人们的认识有一个多次反复、逐步深化的辩证发展过程。一次认识就达到真理是不可能的。通过这部书稿，我们将自己的论点提供到读者面前，衷心希望各位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问题概述	
第一节 1840年以前城市的基本面貌	1
一 城市有较大发展，但没有跨入近代	1
二 牵制城市发展的保守因素	4
第二节 上海开埠和它的辐射作用	10
一 上海的自然历史面貌	10
二 外国资本主义覬觎已久	11
三 上海开埠及四大“中心”的形成	13
四 上海近代因素的辐射作用	18
第三节 1840—1937年城市面貌的变化	22
一 少许变化的55年	22
二 显著变化的40年	30
第四节 遭受列强侵略和吸取西方先进事物	55
一 城市逐步近代化是吸取西方先进事物的结果	55
二 城市逐步近代化是在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 义双重压力下进行的	60
三 《学衡》杂志的呼吁：采择中西文化的精华	65
第五节 影响城市近代化进程的若干因素	71
一 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和地理环境的作用	71
二 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74
三 地区文化传统——城市近代化的文化基因	75

四 道路的多样性和社会的异质性·····	79
第二章 “地方自治”型的南通城市近代化道路	
第一节 南通的自然条件和传统社会·····	81
一 自然环境和传统经济·····	81
二 南通城的历史及其传统功能·····	85
第二节 南通近代化的起点——大生纱厂的创建·····	86
一 南通近代化的前奏·····	86
二 大生纱厂创建之动因·····	87
三 南通近代化的设计师——张謇·····	90
四 大生纱厂创建的过程·····	94
第三节 南通近代化的“全方位”推进·····	96
一 以棉纺为核心的近代工业体系·····	96
二 垦牧公司——近代大农业·····	106
三 近代文化教育事业·····	117
四 市政建设及社会福利事业·····	121
第四节 结 语·····	123
一 南通近代化的若干特征·····	123
二 成就和挫折·····	125
三 南通道路的历史意义·····	135
第三章 时至势会、人自为战——无锡城市近代化的道路	
第一节 无锡走向近代化的关键因素·····	139
一 优越的地理位置·····	139
二 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	140
三 近代化的催化剂——上海近代经济的扩散·····	141
第二节 近代化道路上的无锡·····	142
一 近代化的主要标志——民族工业的发展进程·····	142
二 其他近代化企业·····	152
三 教育和文化·····	157

四 日新月异的都市面貌·····	160
第三节 无锡近代化的几个特征·····	163
一 地区的经济中心·····	163
二 颇具特色的企业家群体·····	165
三 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经营的结合·····	169
第四节 结 语·····	175
第四章 “变商为工”型的常州城市近代化道路	
第一节 常州城市传统：地区政治和转输中心·····	179
一 自然和历史形成的地方素质·····	179
二 传统功能和传统经济·····	182
第二节 晚清常州·····	184
一 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	185
二 商业的新发展·····	186
三 传统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演变·····	192
四 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197
第三节 第一次“变商为工”的浪潮·····	205
一 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	205
二 常州资产阶级与地方政治·····	213
第四节 第二次“变商为工”的浪潮和纺织染工业一 枝独秀·····	216
一 纺织染近代工业一枝独秀·····	216
二 教育、交通的发展和城市面貌的改变·····	226
三 城市转输功能的转化·····	234
第五节 结 语·····	237
一 常州近代化的道路·····	237
二 常州和南通、无锡的比较·····	238
第五章 工业缓慢发展、商业较快繁荣的芜湖	
第一节 武力强制下的对外开放·····	246

一	海关、洋行及不平等贸易·····	246
二	开辟芜湖租界·····	252
三	教堂、传教和教案·····	254
四	对外开放后的城市面貌·····	261
第二节	文化、思想、教育方面的变化·····	262
一	新式学校和报刊的创办·····	262
二	新知识分子群体和新式团体的出现·····	269
三	从“五卅运动”看芜湖城市民众的精神面貌·····	276
第三节	近代工业的缓慢发展和商业的较快繁荣·····	277
一	近代工业的起步和发展·····	277
二	近代工业的若干特点·····	287
三	商业的较快繁荣·····	291
第四节	城市和社会变迁·····	293
一	人口和城市规模·····	293
二	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	295
三	阶级结构、家庭功能和社会组织·····	298
第五节	结 语·····	301
第六章	镇江城市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50年的镇江·····	304
一	转口贸易的发展·····	304
二	早期的近代工业·····	319
三	近代教育的产生·····	323
第二节	辛亥革命后25年间的镇江·····	326
一	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商业的衰微·····	326
二	近代工业发展缓慢·····	330
三	近代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333
第三节	结 语·····	338
第七章	宁波城市近代化和“宁波帮”在外地的发展	

第一节 近代化的自然、历史和文化基础·····	341
一 自然条件和商业经济·····	341
二 宁波商人集团·····	343
三 浙东文化中浓厚的商业色彩·····	347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宁波城市近代化的历程·····	349
一 1887年以前城市的若干变化·····	349
二 1887年以后近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	357
三 城市其他方面的变化·····	366
第三节 近代“宁波帮”——对宁波近代化的一个重要 侧面的考察·····	375
一 新式宁波商人在外地的兴起·····	375
二 宁波商人在外地创办的近代企业·····	380
三 宁波帮与江浙财团·····	387
第四节 结 语·····	392
后 记·····	397
主要参考书目·····	398

第一章 长江下游城市 近代化问题概述

第一节 1840年以前城市的基本面貌

一 城市有较大发展，但没有跨入近代

明清以后，长江下游城市手工业和商品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以苏州为例，手工丝织业一直较发达。^①据记载，康熙年间，“郡城之东，皆习机业”。^②到乾隆年间，“织作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③明朝后期，苏州丝织业中就出现了手工作坊，明显地出现了雇佣劳动。到了清朝，雇佣劳动更为常见。据记载，康熙时，无主的工匠，黎明立桥以待雇主。“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粥后散归”。^④到乾隆年间，随着手工丝织业生产的发展，等待雇佣的劳动力也增加了。黎明“立桥以待”，等不到雇主的工匠，不是“粥后

① 以下参考了范金民：《明朝清代苏州丝织业生产形式和生产关系初探》，载《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9—213页。

② 蔡方炳等：康熙《长洲县志》卷3，第11页。

③ 顾诒录等：乾隆《长洲县志》卷16，第8页。

④ 康熙《长洲县志·风俗》卷3。

散归”，而是延长了等待时间，“日高始散”。^①手工作坊的发展，雇佣劳动的增加，工匠与雇主之间的冲突也发展了。雍正十二年，爆发了工匠抗织，要求增加工资。《长洲县永禁机匠叫歇碑》称：“苏城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原属相需，各无异议。惟有不法之徒，不谙工作，为主家所弃，遂怀妒忌之心，倡为帮行名色，挟众叫歇，勒加银，使机户停织，机匠废业。”于是在何君衡等61家机户联名禀控下，长洲县勒石示禁，强令机匠“各安其业，毋得聚众叫歇误工，致干照把持行市律究处，枷号示众”。^②

按照一般经济发展规律，手工作坊充分发展以后，当会出现手工工场。可是，在长江下游城市，这一段社会历史，在鸦片战争以前并没有出现。苏州丝织业中的手工作坊走向了“领织制”——“包买主”制度。

在嘉庆、道光年间，苏州丝织业中的领织制有了发展，出现了“帐房”。“帐房”是有资金的绸商——纱缎庄。他们自制经纬（经丝和纬丝），发交机户领织。机户各在自己家中雇工匠织造。《清朝续文献通考》记载：“此种雇主，江浙等地为帐房，皆饶有资本之绸商。”^③又据记载：“其所谓帐房者，贮藏织丝，自家不营机工，命他人随意制造织物。”^④机户自己拥有织机，承揽到原料后，即雇工匠到家中织造。或者分一些原料给机工，让机工在自己家中织造。在这种情况下，机工一般有自己的织机。可见，在“帐房领织”制度下，生产规模或是手工作坊，或是家庭劳动。这样，原来在明代出现的手工作坊，没有发展成为工场手工业，反而与包买主式的“帐房领织制”并峙，并逐步退居次要地位，“帐房领织制”发展成为

① 乾隆《长洲县志·风俗》卷1。

② 见《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页。

③ 《清朝续文献通考·实业考》，卷385。

④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二），三联书店，1957年，第452页。

主要的生产形式。商业资本控制了手工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支配商业资本。据不完全统计，到1840年，吴县经造纱缎帐房开业的有11家，年产绸缎7164匹。苏州丝织业出现手工工场是19世纪80年代的事，丝织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过渡则是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才实现的。1916年上海物华丝织公司开始采用电力转动铁织机，出品精良，与苏州手工丝织品争夺市场。因此，苏州振亚织物公司建立，进口机器，使用机器生产。

在社会思想方面，我们举杭州龚自珍为例。龚自珍是1841年去世的，他的思想代表了鸦片战争前长江下游城市思想界的最高水平。他认为嘉庆以后，社会已经到了“衰世”。他形容这个社会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馀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鷄旦不鸣。”^①他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土地高度集中，贫富相距太大。他对社会危机的观察是深刻的。他提出要实行“改革”，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勑改革，孰若自改革。”^②又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③他认为：当时改革之道在于“平均”。他写了《平均篇》和《农宗篇》，设计了一种按宗法授田的土地分配方案，希望通过“挹彼注此”，限制大地主土地兼并，吸收无地的“闲民”做佃户，以达到“太平盛世”。他主张改革，是他向前看的结果；他提出的改革方案，却又说明他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退，向已经“敝”了的“祖宗之法”倒退。正如他自己在《己亥杂诗》中所说：“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④

以上我们分析了苏州城市丝织手工业的发展和杭州龚自珍的社会思想。苏州是当时城市手工业最发达的城市；龚自珍是当时

① 龚自珍：《尊隐》，《龚定庵全集类编》（光绪本），第97—98页。

② 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同上，第68页。

③ 龚自珍：《上大学士书》，同上，第189页。

④ 龚自珍：《己亥杂诗》315首，见《龚定庵全集类编》（光绪本），第367页。

最先进的思想家。苏州丝织业从手工作坊被扭向包买主“领织制”；龚自珍承认“一祖之法无不敝”，主张改革，却又被拖向后退，贩卖古时丹方。总之，在鸦片战争以前，长江下游城市虽然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却没有突破传统，跨入近代。

分析这一段历史，人们可以意识到：在城市向前发展的背后，存在着一股力量，牵制着城市的发展，扭曲着城市发展必然之路。这股力量是什么？这只能是传统中的保守因素。

二 牵制城市发展的保守因素

这些保守因素是什么？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统一的封建集权政治，压抑了商业和手工业

中国古代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皇帝的权威达于每一个角落。地主和官僚结合，为了自己的统治和享受，对商业和手工业实行榨取政策。中国又是一个统一大国，不像中世纪的西欧和南欧那样小邦割据，有迁移回旋的余地，商人无法躲开这种豪夺。明神宗派出大批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对工商业者大肆劫财索税，引起各地人民的反抗。但包括苏州织工反对孙隆掠夺在内的斗争都被明王朝镇压下去了。以无锡为基地的东林党人反对阉党，首先反对矿监、税使，他们主张“惠商”，斗争的结果，也以东林党人的失败而告终。

从统治阶级总的政策看，长期以来重农抑商占支配地位。直到曾国藩，他还在说，“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①皇帝、大官僚与商人处于对立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存，商人只有两条路可走。

1. 一条路是挤入官僚阶层。家里有人做官，经商可以依靠官场

^① 《曾文正公全集·杂著》第3卷，第78页。

关系免税或减税。因此商人小有成就，总要培养一个儿子读书入学，科举做官，实行“一儒一贾”。这样，几代以后，就成为“书香门第”。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明许铤“贾吴中，率三数年或八九年一归，归席未暖复出”，其子许国则读书“补邑诸生”，后“举于乡”，做官到礼部尚书。^①又据《九九销夏录》载：“明叶永盛，字子沐，泾县人。万历中，以御史巡视浙江盐政。……疏请商人占籍应试。今其所著《叶玉成全集》四卷，后附《乡会中试录》一卷，详载其事，并商人占籍后，历科中试者，皆载其姓名。所载至本朝康熙某科，盖后人增入也。此即吾浙商籍所自始。”^②

占籍应试，金声是一例。“金声，字正希，徽州休宁人，随父商武昌，以嘉鱼籍中天启甲子乡试，崇祯元年戊辰，成进士，选庶吉士”。^③

2. 再一条路则是把商业利润投入土地，这是保存财富最少风险的办法。“以末起家，以本守之”，长期成为商业资本流向的信条。仍以徽商资料为证：

“处士(汪)讳名德世昭其字也，……及壮，练达时务，极有条理，父兄悦其能。凡家事内外一以委之，服劳无违命。事商贾每倍得利，归，父兄娱其心。厥考遣世行补邑庠生，处士则丰其资给，勉其专业以成功名，可谓养亲之志矣。……晚年……田连阡陌，囊有盈余。”^④

“许竹逸挟资经吴越金陵十余年，资益大起，广管宅，置田园，以贻后裔。”^⑤

①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483—484页。

② 同上，第486页。

③ 同上，第488页。

④ 同上，第292页。

⑤ 同上，第293页。

“(王)友槐，……商于庐，……家渐饶裕，爱庐之风俗淳朴，买田千余亩，构屋数十楹。”^①

乾隆六十年间，江南米价上涨达四倍，更鼓动商人买土地。光绪年间，陶煦在《租赈》中指出：“上自绅富，下至委巷工贾胥吏之俸，盈十百金，莫不志在良田。”

这样，在中国，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没有出现如西欧出现过的那样一个“第三等级”。在西欧，大约在14世纪，与僧侣、贵族相对立的城市工商业者的上层分子就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国王与僧侣、贵族有矛盾，往往依靠富商，富商帮助国王收税。在一定程度上，特别在早期，国王助长了第三等级。后来，正是从这个“等级”中形成了资产阶级。

（二）传统的社会伦理导向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

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精神动力是无止境地追求利润，积累资本。这种追求，主要通过生产过程实现，因而就同时出现了不断改进生产组织、改进技术工具的追求。韦伯提出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惊人的巧合。基督新教告诉信徒，肉欲是罪恶的，俗世禁欲是必要的，教徒无法得知他究竟是得救还是被定罪，但喀尔文教徒却有一种心理上的趋势，就是在此世寻找他得救的希望。他们从俗世的成功，甚至经济的成功，发现得救的希望。这样理性地工作，尽可能地生产更多的产品，尽可能地获取最大利润。

笔者不想在此全面评论韦伯的学说，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白的，在西欧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确有一种追求更多产品，追求最大利润，发展经济的精神力量——社会伦理。

在中国却是另一种情况。有两种伦理导向值得注意。

第一是“君子忧道不忧贫”。

^①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293页。

孔丘宣扬下列教条是人所共知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这种观念的实质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不必去争名夺利，争富争贵。因此孔丘大力宣传颜回的“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的精神。在财富问题上的这种宿命论伦理思想和尽力追求最大利润的资本主义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自宋以后，理学盛行，进一步宣传“人欲净尽而后天理流行”；“少一分人欲，而后多一个天理”。在这样一种社会伦理主导下，社会经济发展完全失去动力。到明代以后，出现了王学异端。王守仁的大弟子王艮创立了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条理处，便是圣人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是异端”。这样，“去人欲”就成为异端了。这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思想火花，很快遭到卫道士的围剿和人身迫害。

人们的兴趣、热情被引向“道”。孔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物质财富的生产显然居于次要地位。可见统治阶级不仅用政治权利压制工商业，在社会伦理导向方面也压制物质资料的生产。

第二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思想。

与轻视物质生产联系在一起的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长期以来，“平均主义”支配着中国的思想界。

“平均主义”从抽象的道德观念看是完全正确的；从解决贫富矛盾、稳定封建社会秩序看也是有利的。从这方面说，平均主义是“忧道”的产物。但是，从发展生产看，却是起消极作用的。它失去了发展经济、追求最大利润的热情。没有热情，就没有一切。

这个“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是根深柢固的。即使泰州王艮这样一位反理学异端学者也主张“均分草荡”。

从总的道德导向看，是轻视工商的。但具体分析，对商业和手工业的态度又有区别。以孔丘为例，他批评晋国大夫臧文仲有三